

上篇 盟国复兴战略

自国家诞生以来的人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大国的交替兴衰史。伴随着大国的兴与衰，世界亦不断地重新“分化”与“组合”。进入 20 世纪后，先有俄国苏维埃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继之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战前的诸强之一强“戏剧性”地迅速跃升为雄霸西方世界的超强。两强相争，20 世纪的世界政治版图也为之一变。二战中“发财致富”的美国为实现“遏制”苏联的目标，遂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从欧、亚两线对之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战略攻势。“盟国复兴战略”即是对五六十年代美国以苏联为对手而实施的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总体概括。

第一章 世界“兵工厂”与战争“红利”

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取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经济因素无疑是决定这场战争结局的最关键因素。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①经过从“中立法”到“租借法”的转变，珍珠港事件最终推动美国走向了战场。美国参战之后，在陆续投入大量跨洋作战部队参战的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地位，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为盟国输送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兵工厂”。藉此，美国不仅彻底消除了经济危机的困扰，更实现了经济上的扩张，为其战后称霸世界捞取了实力“资本”。

从“中立法”到“租借法”

早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就为正式参战铺平了道路。从“中立法”到“租借法”的转变，即说明了这一点。

30 年代，孤立主义是美国的主流思潮。如同理想主义一样，孤立主义在美国同样有着久远的传统。作为同其他国家相处的一种哲学，孤立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认为欧洲政治象征的是邪恶与堕落，而美国的体制具有优于欧洲的独特价值体系和信念作基础，故商业上可同欧洲往来，政治上则不可与其相谋，否则将会危及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地理条件优越，独处一方，远离他国，拥有天然的安全屏障，惟有中立最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在美国国内受到抵制，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并加入国际联盟，正反映了上述孤立主义哲学在美国是如何的根深蒂固。30 年代空前严重的经

济大危机，客观上又造就了一种关心诸如经济复兴、扩大就业等国内问题甚于国际事务的社会氛围，使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社会得以广泛传播。

即使作为“国际”派代表人物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也难以摆脱这一思潮的强大影响。在 1933 年就职前不久，罗斯福所著《向前看》一书出版。该书详细阐述了他就职后将要实施的内外政策，其中的对外部分不仅表示放弃他一直坚持的美国应该参加国联的主张，而且还明确表示：“不要也不应该把美国拖进欧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治争论中去”。^②1933 年 6—7 月，针对因关税战、贸易战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紊乱、贸易萧条的状况，由英国提议、共 64 国参加的著名伦敦国际经济会议召开。会议旨在通过各国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贸易的复兴和发展。对这一主张和措施，罗斯福曾表示赞同并应邀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但在会议进行中，却因顾虑国会内孤立主义派的反对意见，担心有关“新政”立法受阻，突然电告出席会议的赫尔国务卿，拒绝签署任何协议，致使这次国际会议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种强大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于 1935 年 8 月制定了“中立法”。该年 3 月，纳粹德国正式撕毁凡尔赛条约，宣布重建国防军，跨出了作为战争策源地的关键一步。值此法西斯日益猖獗、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之际，美国应采取何种对欧政策，是联合各国共同阻止法西斯的扩张，还是置身事外，采取孤立态度，遂成了美国政界本不应引起争议的争议焦点。不幸的是，由于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选择了后者，走上了一条所谓“中立”的道路。事实上，早在此之前，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就已为此作好了充分的准备。1934 年 4 月，美国参议院根据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极端孤立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J·奈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火制造和销售情况

进行特别调查的决议案，并设立了一个由 P·奈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意公布大量调查材料和机密文件，在其报告中肆意夸大银行家和企业家的影响，以此证明美国是被大银行家、大军火商拖进上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参加上次大战是个悲剧。这份报告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到 1937 年 4 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时，还有近 2/3 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错误。^③ 因此，奈委员会的活动等于“为孤立主义者提供了一块跳板，引出了我们现时代的第一个中立法”。^④ 该“中立法”于 1935 年 8 月 31 日在国会获得通过，同日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生效，有效期为半年。依该法规定，在总统确认并公开宣布国外存在战争状态之后，美国就需对交战诸方实行武器禁运，总统不得指定谁是侵略方并对之给予惩罚。^⑤

此后，该法又经两度修正，内容也得以扩充。1936 年的修正案增加了如下内容：除美洲各国外，禁止向交战各方提供贷款。1937 年的第二次修正案又新增了两项重要内容：（一）军火禁运同样适用于进行内战的国家；（二）同美国从事除军火之外的其他贸易的交战国，须以“现款自运”的方式进行。另外，新法案还禁止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⑥

关于对美国“中立法”的理解，应该把握三点。其一，如上所述，它是当时美国强大孤立主义思潮下的产物。因其强大，1936 年和 1937 年的修正案才会产生，也因此，直到 1939 年 9 月 3 日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之后，美国仍然宣布坚守中立，尽管这时的中立已大异于以前的中立。其二，它在客观上起了纵容德、意法西斯扩张的作用。在“中立法”之下，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同被视为交战国而予以同等的军事禁运，无异于是对侵略者的一种奖赏。侵略者之所以敢于发动侵略，往往皆因有备而来，惟一难于把握的因素就是担心他国的介入。既然当时值得顾忌的几大国中，英、法热衷于绥靖，美国又坚守中立，法西斯意大利便可明目张胆地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可以悍然

发动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先是重占莱茵区，继之并吞奥地利，接着又借堪称绥靖之经典的慕尼黑协定这块招牌，使捷克成了囊中之物，终致养虎为患，浩劫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三，“中立法”实施的主要对象是欧洲。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其主流来说，则以“门户开放”为原则。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行径，虽因国内孤立主义、政府既定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战略方针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美国并非没有绥靖的嫌疑，但从 1933 年的“不承认主义”，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后颁布的海军扩建法，1939 年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 1940 年 1 月 26 日到期后不再续约，1940 年春美国太平洋舰队集结夏威夷的“威慑行动”，及一系列的援华行动，对日的能源禁运，冻结日本在美资产，1941 年同日本针锋相对的谈判，直到 1941 年 8 月对日全面禁运，11 月 26 日向日本发出被其视为“最后通牒”的《赫尔备忘录》，说明美国是采取了一种相对而言较为积极的斗争姿态的。

对于美国的中立，应该注意其内部存在的消极中立派和积极中立派的差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美国为何能够从“中立”最终走上参战的道路。消极中立派以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参议员波拉、P·奈、范登堡为代表，积极中立派则以总统罗斯福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在战略上，消极中立派和积极中立派都主张美国奉行中立政策，但执行何种中立政策，即在策略上，两派之间却有两点明显的区别。首先，消极中立派主张严守中立，“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对于由英、法控制的国际联盟的活动，当然也不应参加。相反，积极中立派则认为，美国不能完全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对于世界和平应尽一份责任”；在执行中立政策时，可以采取“除了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罗斯福虽放弃了加入国联的主张，但坚持要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其次，消极中立派认为，为了严守中立，在运用中立法时，必须“以命令的方式束

缚总统”，不应赋予总统以“过大的权力”；而积极中立派则认为，总统在行使中立法时，应根据情况，灵活运用，总统“应有酌量采取措施之权”。^⑦很显然，若按消极中立派主张，美国势必要孤立到底，至死不悟。所幸，美国有积极中立派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因“除了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的制约而打了一定折扣，但终使美国走上了联合反法西斯的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总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1937年10月5日，正值“柏林—罗马轴心”使欧洲分裂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集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罗斯福在当时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quarantine speech”）。演说不仅不指名地谴责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为，而且还坚定地表达了各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联合起来，共同对破坏国际条约、制造“疫病”的法西斯势力实行“隔离”，进行抵制。^⑧尽管这篇演说当时就受到国会内外孤立主义者的大肆攻击，罗斯福甚至被称作“战争贩子”，由此影响了罗斯福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它在当时孤立主义情绪非常浓厚的美国所起的震聋发聩的作用及对日后美国的参战所具有的意义，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1939年9月3日，即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当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诚恳提醒美国人民，欧洲的冲突不会不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安全。^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罗斯福在9月21日又向国会发表演说，要求撤销中立法中的武器禁运条款。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全国长达两个月的激烈辩论，最后参众两院终以60票对30票和243票对172票通过了新的修正法案，废除了不得把军火输往交战国的禁令（但需坚持“现款自运”方式），使美国向英法提供武器和物资上的支持成为可能。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美国及时向英国运送了一批步枪和大炮。1940年8月，以英国在纽芬兰、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圭亚那等地的八个海军基地的99年使用期为交换条件，送给英国50艘逾龄驱逐舰，以对付德国潜水艇的侵袭。这些行动标志着美国

在事实上已放弃了“中立”立场，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标志着美国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了。^⑩

1940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罗斯福破天荒以压倒多数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也充分说明了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程度。此时欧洲战事日益吃紧，法国陷落，英国的压力加重，但其财政已陷于困境，物资极度短缺，难以“现款自运”，遂要求美国给予“决定性的援助”。^⑪对于美国来说，决心援助英国已不成问题，只是如何援助的问题。鉴于一战时的援欧贷款因迟迟不能收回，造成了 20 年代严重的贷款信誉问题，为减少孤立派反对援英的阻力，罗斯福政府确立了以物品而非美元的援英政策。1941 年 3 月著名的“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法案授权总统，“可向任何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国防物资。^⑫

“租借法案”的制定是美国走向参战之路的关键一步。该法案通过后，美国即开始向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输送大量武器等战略物资。为保证运输航道的畅通，对付德、意的“挑衅”，美国由冻结其在美资产，扣留其在美港口船只，宣布在大西洋海域扩大美国的“安全带”，进驻格陵兰、冰岛，到宣布国家处于“全面紧急状态”，海军护航，发表“大西洋宪章”，美国事实上同纳粹德国已经处在未宣战的战争之中了。珍珠港事件只不过是更加坚定了美国参战的决心而已。

战争动员

世界战争史表明，经济资源（包括人力、物质、生产等）所具有的潜力对于战争进程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如何调动、管理和使用这些经济资源，亦即如何使其充分服务于战争，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更为关键的一环。

从欧洲战争临近、爆发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的近三年时间里，美国在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同时，仍以避免直接卷入“真枪实弹

的战争”为目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美国没有迎战的准备。作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资源并处在从“中立”向参战发生转变过程之中的国家，面对纳粹势力膨胀而英法等反法西斯国家处境越来越不利的形势，美国在步步加强对反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对英国物资援助的同时，更以“防御”之名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动员。

舆论动员。从“中立”到参战，也是积极中立派与消极中立派争取舆论支持的一个曲折过程。作为消极中立派的中坚，孤立主义势力之强大已如上述，而其顽固程度则由下例可见一斑。就在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 1941 年 12 月 7 日，孤立派领袖、参议员 P·奈还在匹兹堡发表演说，反对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演说尚未完，便传来这一令全美国“震惊、愤怒”的消息，他也只好带着惭愧结束了这场被看作美国参战前最后一次孤立主义的演说。^⑬积极中立派最初无疑是少数，但仍以坚韧的毅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舆论动员。除总统罗斯福利用政策宣示、演讲、记者会等各种机会策略而又果敢地积极引导舆论之外，民间人士也进行了积极配合。欧战爆发不久，一些有识之士便成立了一个鼓动修改中立法法的“超党派委员会”组织。该组织由堪萨斯州的威廉·艾伦·怀特领导，其分会曾遍及 30 个州，“为支持取消武器禁运条款，该委员会的宣传在扭转舆论方面起过决定性的作用”。1940 年 5 月 17 日，该委员会又重组为“援助盟国以保卫美国委员会”，几个月之内就在全美国发展起六百多个分会，带头在全国反对孤立主义，激发公众支持政府除参战以外全力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政策。^⑭正是他们的努力，加之欧洲战争的冲击，使得“大西洋宪章”受到赞扬，“租借法案”顺利通过，珍珠港事件之后，全国民众不分党派，抛开歧见，全力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

人力动员。1940 年夏，纳粹德国相继侵占了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并迅速征服了法国，欧洲战况急转直下，形势迫使美国扩大总共仅有 40 万人的部队兵力。按当时一些参加过一战的

军官估计，美国仅为保卫自己和拉丁美洲“后院”，就必须有 100 万人的陆军。要达到这一规模，自然需要实行征兵制度。然而，“中立法”的存在表明美国仍处于和平时期，和平时期征召兵力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此时，总统竞选正酣，受孤立主义者及各种“和平”社团的影响，相当一部分选民在征兵问题上左右摇摆。如何既达征兵目标，又不影响竞选，确实是当时罗斯福面临的一个难题。为此，罗斯福一面同意由陆、海军联合提出一项“征兵法案”，通过幕后活动制止在民主党的演讲中发表反对征兵的讲话，一面利用人们认为征兵对国防实属必要，但又担心卷入战争的心理，根据民意的变化，及时表明立场，反击孤立派的攻击，赞扬征兵乃“征集”国家财富、捍卫自由之举，最终赢得了公众的支持，迫使国会于 9 月 14 日通过了一项“选征兵役制法案”。法案规定，凡 21 岁至 35 岁的男性公民均在选征之列。法案公布之后，得到了民众的积极响应。在登记应征的 10 月 16 日，应征人数高达 600 万之多。^⑮美国正式参战后，征兵年龄扩大为 20 岁（1942 年降至 18 岁）至 44 岁的男性公民，年龄在 45 岁至 65 岁之间的男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广大妇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也应征服役，组成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或各种后备队，分布于各军种各部队，担当着各种不可或缺的职责。正是这种有效的人力动员，为美国提供了充足的兵员。据统计，1939 年，美国的现役军人只有 40 万；1940 年为 60 万；1941 年，也就是实行征兵后的第一年，即达 160 万；1942 年为 200 万；之后的三年，即从 1943 到 1945 年，更分别高达 910 万，1140 万和 1130 万。^⑯

军备动员。随着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基于其对西半球安全将造成潜在威胁的忧虑，建立强大防务以确保美国本土及其“后院”的可靠安全，就成了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并从一开始就有着高度的共识。这种共识，加之随局势的变化而产生的大量对外援助需求，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军备动员工作。1938 年 5

月，美国制定“文森法”（又称扩充海军法），计划在今后十年开支约 10 亿美元，建立一支强大到足以对付日、德、意联合舰队的海军。1939 年 1 月，国会不仅批准了总统关于为国防建设正常拨款 13 亿美元，另增拨 5.25 亿美元用于生产飞机的计划，而且还授权总统着手贮存战略原料，以备战时之用。欧战爆发、美国武器禁运条款解除之后，飞机、枪炮及军火严重供应不足。根据 1940 年 5 月的统计：“美国只有由 260 个飞行员驾驶的 160 架飞机，此外共有 52 架重型轰炸机，这比据信作为美国国防最基本的需要量少了 83 架飞机。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弹药也十分匮乏”。于是，国会便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份连续三次增加了国防拨款。先是 15 亿（比罗斯福要求的多出 3.2 亿美元）继之追加 1 亿美元，用以加强海军航空兵的力量；6 月底以应总统请求，增拨 17 亿美元，同意将陆军正规军从 28 万人扩大到 37.5 万人，并授予总统征召国民警卫队服现役的权力。^①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除大量的对外援助之外，美国本身的军需战备动员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警卫队于 1940 年开始征召服役；现役参军人数相当于 30 年代中期的六倍；陆军航空部队从 1936 年开始增加购买战斗机，仅 1941 财政年度（1940 年 6 月至 1941 年 6 月）就购买了 4429 架；海军舰艇于 1939 年开始加速建造，到 1941 年 12 月，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的战舰达 1100 艘，接近占二战期间所使用战舰 1200 艘的 92%。^②

经济动员。无论是扩军、备战，还是对反法西斯国家的援助，都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持。随着国内防务计划的扩大和外贸需求的增加，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扩大军需生产，通过有效的管理集中服务于国防计划，成了经济动员工作中的核心。1939 年 11 月，美国钢铁公司负责人斯特蒂纽斯（E. R. Stettinus）曾受命领导许多大企业成立“战争资源委员会”（the War Resources Board），试图通过确立一种同大企业建立紧密联系的单一领导体制，来协调军事生产。但因其主张在政治上难以被罗斯福接受，

故成立不久该委员会即告解散。1940年5月，总统成立“紧急管理局”（the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原“国防顾问委员会”隶属其中，其成员由企业、劳工组织、政府及大学的代表组成，有些成员还参与过一战和“新政”的组织管理工作。该委员会在其存在的短暂时间里，曾就改进数据收集、控制备战生产合同的利润及合理确定重点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步骤。1940年8月，为推动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国防工厂联合会”（the Defense Plant Corporation）又应运而生。罗斯福大选获胜之后，鉴于上述组织的效率不够理想，遂进一步做了较大调整。1941年1月，“生产管理局”（the Office for Production Management）取代“国防顾问委员会”，由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努森（W.S.Knudsen）和服装业工人联合总会负责人希尔曼（S.Hillman）分别任主席和副主席，其主要职责之一是确定哪些国防材料急需和如何更好地组织生产这些材料。但因其进展缓慢，总统于9月又成立了“优先供应和分配委员会”（the Supply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 Board），副总统华莱士任主席，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担任执行主任，是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除总统之外的最高生产、供应协调指导机构。总起来看，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动员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如各机构之间协调不力，效率不高，但无疑是美国向战时经济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①

世界“兵工厂”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在为“租借法案”进行辩护的著名“炉边谈话”中，首先陈述了援助正奋力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国对于美国自身安全的重要意义，继之又向美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②

为此，美国开始建立旨在促进军备生产的战时经济体制。

1939年到1941年12月的经济动员是美国向战时经济体制过

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成效，一是为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摸索经验，二是藉生产的扩大满足了以英国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军用品的需求。从 1939 年 8 月到 1941 年 12 月，仅美国的工业生产就几乎增加了一倍，出口贸易则从 1939 年的 31.77 亿美元增长到 1941 年的 51.47 亿美元。^② 由于武器禁运解除、“租借法案”出台后产品的绝大部分是卖给或租借给同盟国，因此，几近 20 亿美元的出口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同盟国援助的规模。

参战之后，美国迅速向战时经济体制全面转轨。首先，整顿管理机构。1942 年 1 月，罗斯福将“生产管理局”和其他一些与生产有关的机构合并，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the War Production Board），由唐纳德·纳尔逊任主席负责推动、监督、协调全国的生产，是国内经济的最高领导机构。1943 年 5 月，针对该委员会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混乱，又成立“战时动员局”（the 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由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F·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出任局长，负责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

其次，采取措施推动企业由民用向军用转产。战前动员时期，因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1939 年到 1941 年消费水平增长 25%），企业有利可图，故不愿由民用向军用转产。为此，美国政府推出了减税、保证企业利润、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汽车工业几乎完全转向制造飞机、坦克、吉普车和其他军用品，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三，政府出资兴建兵工厂。为全面满足战争的需要，除了使现有生产设备转产之外，还必须投巨资扩充新设备。这项任务靠忙于转产的民间企业无法完成，只有靠政府的力量加以解决。基于此，美国政府通过“国防工厂联合会”设立了大量的各类战时兵工厂，共出资高达 160 亿美元。到战争末期，联邦政府拥有全国 90% 制造人造橡胶、飞机、镁及船只的设备；70% 的制铝设备和 50% 的工作母机设备；还包括有炼钢、高辛烷汽油和化学药品的工厂及全长 3800 英里（约 6100 公里）的输油管工程。

第四，实行经济管制。除对钢、铝、铜等战略物资实行彻底的控制以外，还建立了涉及轮胎、汽车、汽油、糖、鞋、燃料油、咖啡及其他各类食品的配给制。“物价管理局”（the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则根据国会 1942 年初紧急物价控制法，规定了各地区的最高物价与最高租金额，并负责向生产厂商提供用以防止物价上涨所必须的津贴。1942 年 10 月 2 日，国会又通过反通货膨胀法，授权总统把工资、物价、薪俸冻结在同年 9 月 15 日的水平上。总统设立经济稳定局代行此职，规定没有该局批准，工资与薪水一律不准再增加。当煤矿工人在约翰·L·刘易斯带领下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时，总统甚至还下令接管了煤矿，强令矿工返回矿井。

第五，增加税收。人力、物力、财力是战争制胜的三大要件，而财力的解决又是关键的关键。对此，美国政府开了两个渠道。一是发行公债，如储蓄公债、战时公债、胜利公债等，一是增加税收。1940 年的“岁入法令”虽未增收新的税款，但对当时的一切税源都提高了比率或是加宽了基数。1943 年的“付税法”规定在工资和薪水内扣缴所得税，从而开始了一项“凡有所入，必须纳税”的新计划。从 1941 到 1945 财政年度（每年的 6 月），课税收入约达 1385 亿美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约占 36.2%，各商业公司税款占 34.2%，其余的 29.6% 来自租赁税、就业税、关税等其他税源。值得注意的是，二战期间仅税收和非借款性质的收入就解决了全部战争费用的 43%，而一战时这类收入还不到全部战费开支的 1/3。

第六，加强科技的集中研究与开发。科学技术的运用是现代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爆发时，美国不仅在喷气推进、雷达及其他电子仪器方面比不上英国，而且在研究原子裂变、喷气推进及火箭方面更远远落后于德国。这种状况，不能不令美国政府和科学界担忧。继 1940 年 6 月成立由国防部门、各大学、私营工业代表组成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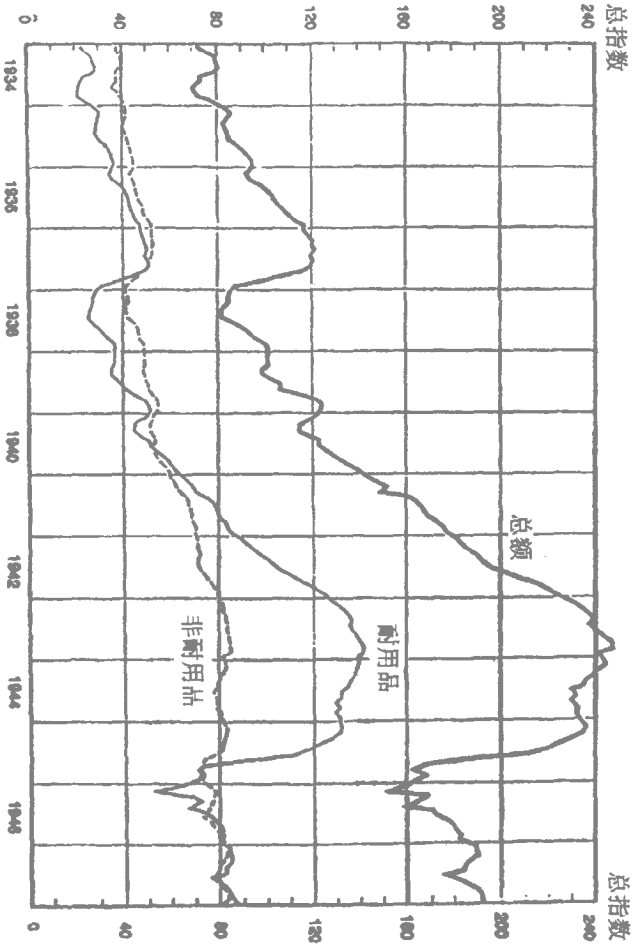
经过一段摸索之后，为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科研力量，政府于 1941 年 6 月调整研究规划，设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由卡内基学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V. Bush）出任局长。该局有权批准或否决所有科研项目，负责提出新的研究任务。通过该局的努力，战时美国在雷达、电子设备、军用火箭、炸弹、导弹、无线电引信、原子弹、药品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武器。^②

正是上述在体制方面的及时转轨，极大地调动了美国的财力和物力，不仅满足了自身的战时需要，而且还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援助反法西斯盟国的需要。

从 1941 到 1945 财政年度，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为近 3176 亿美元，仅直接用于战争的经费就占 88.6%，高达 2815 亿美元。除税收和其他非借款性收入来源外，联邦政府还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券，1941 年的国债仅 489 亿美元，1945 年累计则高达 2587 亿美元。直接战费的使用分配，陆军为 1596 亿美元，海军 884 亿美元，其余用于美国海关委员会、战时航运总署和各政府部门或行政单位的开支。^③

财力方面如此，物力方面尤其雄厚。鉴于战时工业的特点，耐用品工业的增长速度异常惊人。在 1943 至 1944 年的工业生产增长高峰期（见图：1.1），其增长指数（以 1935—1939 年的平均增长数为 100）高达 239%。从图中可以看出，耐用品工业的增长指数远远超过了非耐用品工业的增长指数。据统计，从 1939 年到 1943 年，运输设备（包括汽车、飞机、铁路设备和船只）增长了 600%；机器生产增长了 300%；有色金属增长了 100% 而非耐用品工业虽没有耐用品工业的增长速度那么快，但在战争需求的刺激下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例如，从 1939 年到 1945 年，纺织与酒精饮料业的产出增长了 50%，食品加工业也增长了 40%。^④

图 1.1 1934 — 1946 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化
(1935 — 1939 年平均数为 100)



Sou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Washington DC, 1947), from world War II: The End of the Depression

与耐用品工业增长相联系，军火生产更取得了“奇迹”性效果。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美国三军只有 1157 架适于作战的飞机和数量相同能供使用的坦克。通过五年的生产，即从 1940 年 7 月 1 日到 1945 年 7 月 31 日，全国制造了 86338 辆坦克，29.7 万架飞机，1740 万支来福枪、卡宾枪和供佩带的武器，大量的火炮装备及弹药，6.45 万艘登陆艇，上万艘海军战舰、货船和运输舰。五年之内，美国的商船舰队增加了四倍，海军火力增加了十倍。^⑤如果按产值计算，1941 年美国生产的战争物资仅 84 亿美元，1942 年总产值即达 302 亿美元，等于德、意、日三国总产值之和，到 1944 年，美国工厂生产的物资，等于三个轴心国生产的两倍。^⑥

庞大的生产规模，为美国履行其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诺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从 1941 年 3 月 11 日到 1945 年底，美国根据其“租借法案”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货物和劳务共计为 480 亿美元（最初国会同意的租借拨款只有 70 亿美元），其中劳务占 85 亿美元，货物占 395 亿美元。在货物转移里，又包括从 1945 年 9 月 2 日到 12 月 31 日提供的 7 亿美元的民用品有偿转移，其中的条件是利率 2.375%（英、法为 2%），偿还期 30 年（英、法可 30 年以上）。余下的 388 亿美元货物转移，英国约占 66%，苏联约占 24%，合计高达 90%，另外的 10% 分布在其他国家（参见表 1.1）。^⑦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其首要的基础是“伟大同盟”中各国间的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人们经常谈到的在战场上的相互呼应，密切配合，而且也体现在物资方面的相互支持上。美国作为世界“兵工厂”（表 1.1 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其世界性）给予盟国的援助无疑是巨大的，所起作用也是关键性的。但我们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各盟国从物资上给予美国的尽可能的支持。事实上，从 1942 年 9 月 3 日同英国签署“互援协议”（reciprocal-aid agree-

ment) 到 1945 年 12 月 31 日, 美国通过“逆租借”(reverse lend—lease) 渠道得到盟国无需偿还的援助达 72.72 亿美元, 其中货物援助为 42.73 亿美元, 劳务援助为 30 亿美元。货物援助中, 绝大部分(41 亿美元, 占近 97%) 用于满足美国在海外驻军的需求, 其中大炮、飞机、坦克、给养及其他军用品约占一半, 余以汽油、石油、食品及其他日用品为主, 只有价值约 1.5 亿美元包括橡胶、茶叶及其他物品运到了美国本土。②有关美国所得货物种类与国家分布, 参见表 1.2。

表 1.1 美国提供的租借货物：种类与分布

(1941.3.11—1945.9.1)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总计	大炮 与 军械 器材	飞机 与 航空 材料	坦克 与 其他运 载工具	混合 军事 装备	农业 工业 及其他 日用品	其他 货物
总 计	38803	4320	8549	6178	3809	14516	1431
英 国	25345	3066	6334	3795	2144	9312	694
苏 联	9729	790	1571	1768	778	4193	629
法 国	2460	230	282	412	755	743	38
中 国	476	147	130	99	44	46	10
荷 兰	172	11	83	8	8	58	4
比利时	85	1	1	13	17	53	*
美洲各国	345	51	141	69	50	18	16
其 他	191	24	7	14	13	93	40

* 不足 50 万美元。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ar, 1940—1945*. Washington D. C., 1948, p. 22.